

## 礼物祛魅：清朝官员贪贿案件的历史考察

蒋习轶

**摘要** | 清朝官场镶嵌于中国官僚政治制度和儒家传统文化之中，官场中礼物往来馈送显示了儒家意识形态的文化构建向实践的政治图景转变的一个过程。清朝从制度层面对“馈送、收受礼物”行为进行严格管理、控制，礼物与贿赂之一般关系未被厘清，致使司法运作过程中“礼物馈送”与“利益交换”存在诸多模糊不清之弊。通过对“礼物”的政治、经济、文化属性之分析，从制度基础、外部环境及心理动机阐释“馈送、收受礼物”行为之发生逻辑，对“馈送、收受礼物”行为律例规制之限度进行反思，理解官僚政治体制的制度纠结，揭示法律与权力策略、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的互动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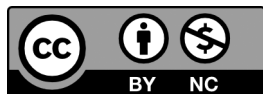
**关键词** | 馈送、收受礼物成案；大清律例；官僚政治体制；律例规制限度

**作者简介** | 蒋习轶，中山大学法学院法律史专业 2020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法律社会史。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从古至今，政治腐败都是国家治理最为棘手的难题，是世界性难题，在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都存在腐败问题，只是腐败程度、表现形式以及打击力度各有不同。腐败影响着政府治理的公平性与效率性，影响着国家或地区的长久发展，我们应当对其有更深入的理解、更敏感的察觉以及更灵活的控制。

各国的腐败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根源于其无法脱嵌的时代经济发展与文化脉络，以我国 2016 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9号)为例，其专门颁布了“感情投资”条款，即：“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形式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由于该条款并未要求证明收受财物行为与请托事项之间存在合意的对价关系，学者对该条款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展开了激烈探讨，关于是否要增设“收受礼金”罪也引发诸多争议。<sup>[1]</sup>历史中的巧合和

[1] 相关成果有车浩：《贿赂犯罪中“感情投资”与“人情往来”的教义学形塑》，载《法学评论》2019 年第 4 期，第 27-35 页；黄鹏：《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司法解释的教义学分析》，载《经济刑法》2017 年第 17 期，第 203-212 页；罗开卷、陈庆安：《感情投资型索取、收受财物行为之入罪要件论》，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0 年第 5 期，第 97-107 页；曾妮：《感情投资”型受贿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大学 2021 年硕士学位论文。

必然共同促成了清朝“馈送、收受礼物”犯罪与现今司法解释中“感情投资”条款的汇合,今中国重新伫立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上,人们在此过程中常常忽略此前历史中的一些微小的细节,也极有可能让以往的错误再次重演一遍,如果不加区分地以“馈送、收受礼物是腐败,腐败导致衰亡”这样的简单逻辑一言以蔽之,它无法向我们提供判断中国帝国晚期社会真实图景的依据,也不能自洽于中国传统伦理背景与文化追求,由此难以窥见其律例制度与真实现实存在的巨大罅隙,就更难理解清王朝演进、发展及衰亡的真正原因,本文希望通过深入发掘“礼物”在清朝官场的表象与本相,阐释中国传统法律的深层理念,以期为当今现实提供镜鉴。

## 一、模糊的审判:官场“馈送、收受礼物”行为的法律风险

### (一)“馈送、收受礼物”行为的规范规制

明朝时官员将“馈送、收受礼物”行为视为交际之礼,清初官场将该行为视为处于灰色地带中的“陋规”的一部分,虽未能被正式体制所接受,但官方整体表现出默认之态度。自康熙始,统治者将“馈送礼物”之行为性质等同于行贿,将“收受礼物”之行为等同于破坏政治公平,认为其对政治民生之影响极大,“盖上司既受属员之馈遗,又何以禁止属员之贪墨,甚至以馈遗之多寡分情谊之厚薄,则属员之优劣何以辨别,而吏治尚可止,馈遗必不能秉公察吏,不能秉公察吏必不能有益于政治民生……”<sup>[1]</sup>乾隆帝始终认为:“我皇考澄清整饬之良规,万世所当遵守者,何忍稍有逾越,渐致纵弛,用是特申诫谕,务各懍遵。如有暗中收受者,或经朕访闻,或被风闻参劾,必严加议处,以为簠簋不饬之戒。”<sup>[2]</sup>国家已确有律文对“馈送、收受礼物”行为进行管理与控制,包括行政处分与刑事处罚,明清以降,皆呈现出愈加严苛细密之特点,无论从行政管理制度体系抑或是刑事法律制度的规制来看,帝王们未曾厘清“礼物”与“贿赂”这一对概念的模糊边界,均不承认“馈送、收受礼物”这一行为内在违拗的合理性。

### 1. “馈送、收受礼物”行为之行政处分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对官员“馈送、收受礼物”之行为进行严密繁复之规定,康熙九年议准:“官员因事夤缘,私行馈送,发觉之日,与者、受者俱革职提问,如馈送之时,不即行出首,后经发觉,虽所馈之礼未受,亦罚俸一年。”<sup>[3]</sup>十七年覆准:府、州、县等官,若无公事,私谒上司,并赴省庆寿,夤缘通贿,馈送银钱等物行贺者,俱照前例处分。”<sup>[3]</sup>十八年议准:“督、抚、司、道官员赴任时,谒见在京大臣各官,或自任所遣人馈问者,俱革职。其大臣各官,不行首告者,一体处分。”<sup>[3]</sup>《定例成案合镌》对“馈送礼物”“府州县赴省拜寿馈送行贺”“送钦差官下程”“大臣官家不许往来馈送”“差遣大臣送礼准算部民子女转送人情”等细琐情事都做了非常详细之规定。<sup>[4]</sup>乾隆进一步加强对官员往来之情事的限制:“凡在京官员与至亲切友、同乡世谊往来庆吊,原于名节无关,设或请托公事,瞻徇情面,亦不论其为何等之人,皆干严例……”<sup>[5]</sup>乾隆七年《吏部处分则例》相较于雍正十二年增设了对“京官滥行结纳”“上司书役与属员互相拜谒”等为之惩治措施,乾隆三十四年再次修订《吏部处分则例》时增设“外任职官不准谒见王公”“禁止换帖等事”“严察各署幕友交接”等条文。<sup>[6]</sup>

### 2. “馈送、收受礼物”行为之律例规制

除行政处分的严格规制外,“馈送、收受礼物”行为被帝王纳入刑律管控范畴,大明律“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条载:“若接受所部内馈送土宜礼物,受者,笞四十;与者,减一等。若因事而

[1]《雍正朝起居注》,雍正六年七月二十六日条。

[2][清]王先谦撰:《东华续录(乾隆朝)》,乾隆四,清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刻本。

[3][清]伊桑阿等编,杨一凡、宋北平主编,关志国、刘宸纓点校:《大清会典·康熙朝》,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127页。

[4]参见杨一凡编:《清代成案选编(甲编)》第4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1-159页。

[5][清]《大清会典则例》卷十四吏部,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参见孟姝芳:《乾隆朝官员处分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40页。

受者，计赃以不枉法论。其经过去处供馈饮食，及亲故馈送者，不在此限。”<sup>[1]</sup>《读律琐言》解释道：“盖土宜礼物，虽为交际之礼，而监临部内，非交际之人也。若又因事而受所部内土宜礼物者，计赃，以枉法论。土宜礼物非金银之比，交际之礼非行求之赃，依名例答罪，附过还职，不在犯赃罢职之律。”<sup>[2]</sup>此时，明朝仍认可一部分馈送、收受礼物行为为交际之礼，清袭明律，仍将“馈送、接受礼物”列入大清律例中，并在雍正七年增设：

“凡上司经过，属员呈送下程，及供应夫马车辆一切陋规，俱行革除。如属员仍有供应，上司仍有勒索者，俱革职提问。若督抚不行题参，照例议处。”<sup>[3]</sup>

## （二）“馈送、收受礼物”案件的司法实践

法律抽象的逻辑推演与各式的真实主张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为纯粹的礼物交换与实质的利益输送两者之间划出一个边界，指明何时、何地、何种形式的礼物交换行为应该遵从工具理性或遵从价值理性，遵从平等伦理或遵从差序伦理，这是一件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事情”。<sup>[4]</sup>我们本希冀从司法实践中看到古代官员如何区分馈送与贿赂之边界，观察当时情境下如何区别“礼物”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但事实上，通过清代成案“馈送、收受礼物”案例分析，可以发现一系列成案并未能固定下来成为定例，不同案件难以总结出审判规律，更有甚者，类似成案审判结果存在分歧。概而言之，其定罪条文、量刑标准、审判尺度都存在模糊不清之弊藪。

### 1. 适用律例混乱，罪刑无法法定

《大清律例》“受赃”中，分别规定了官吏受财枉法与不枉法的起刑点、刑等累加计算标准与量

刑上限，分有不同情状以适应不同程度之刑罚。但“馈送、收受礼物”案件情节叙述都较为含混模糊，不同审判官适用律例并未阐明法理，有以“坐赃致罪”条论，有以“因公科敛”条论，有以“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条论，在《馈送上司银两无行求事照坐赃减五等案》一案中李松差遣长随常升馈送官员一千两，因无事请求，判决“李松照坐赃致罪”<sup>[5]</sup>，与者，减五等，律杖一百，本案革职”。<sup>[6]</sup>但在与此相似之案件，陕州知州罗□出境馈送御史曾□手本，开送贽仪八十两，……供与知州交接往来，原无营求，谋为情节，亦非诈索赃私，除罗□坐赃、失察各轻罪不议外，但罗因事馈送御史曾□贽仪八十两，罗□应照凡有以财行求计，所与之赃，与受财人同科例，有禄人枉法，赃八十两，绞监候律。<sup>[7]</sup>上述两案均为馈送给上级官员礼物之情由，前者馈送一千两银以“坐赃致罪”条论，律杖一百；后者馈送贽仪八十两，照“有事以财请求”条论，绞监候律。相关律例之引用并未有充分合理之解释，通过官员依据自身审判经验比照律文，容易造成“同案不同判”之弊端，致使适用律例任意性与不确定性增强，无法保证国家司法的公正性与权威性。

### 2. 入罪门槛较低，律文流于形式

《收受钱文酒肉柴草照因公科敛》一案中，直督孙□疏称，李威收受钱文酒肉柴草入己，共合银六两五钱七分五厘，将军李威等拟以杖笞，应如该督所题，李威合依因公科敛财物入己者，计赃，以枉法论。一两至五两，杖八十，折责三十五板，系贪官不准收赎，永不叙用。<sup>[8]</sup>根据岩井茂树的研究，白银在18世纪的100年间，白银的购买力不断降低，导致了物价上升，大明律有关官员贪贿的入刑标准大多为“一两”，清朝

[1] 杨一凡点校：《皇明制书》第3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0页。

[2] [明]雷梦麟、怀效锋、李俊点校：《读律琐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27页。

[3] 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卷三十一“受赃”，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97页。

[4] 孙邦金、陈安金：《论儒家的礼物观念》，载《哲学研究》2013年，第39页。

[5] “坐赃致罪”条载：“凡官吏人等，非因枉法、不枉法之事而受人之财，坐赃致罪……与者，减五等……一两以下，笞二十；一两之上至十两，笞三十；二十两，笞四十……五百两，罪止杖一百、徒三年。”

[6] 杨一凡编：《清代成案选编（甲编）》第19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57页。

[7] 杨一凡编：《清代成案选编（甲编）》第4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1页。

[8] 杨一凡编：《清代成案选编（甲编）》第19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55页。

未考虑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而直接沿袭旧律,贪贿罪入罪门槛过低,容易造成动辄“出入人罪”之弊端,过低量刑标准造成贪贿案件泛滥,倘若一一查处,将耗费极大司法成本;又,鉴于“馈送、收受礼物”行为难以察觉与定罪之特点,绝大部分馈送、收受礼物之行为将隐匿在官场之中,极易导致律例束之高阁,形同虚设。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四十三年《差遣大臣送礼》载:“部议凡差遣大臣官员人等至各省督抚,地方官有愿送礼者,以四十两为止,道路经过,地方官有愿送礼者,以八两为止,要妄行勒索督抚题参定额外,多与多受者,照刑部定例议处。”<sup>[1]</sup>笔者本以为可以凭此视为“礼物”区别于“贿赂”之一般界限,在犯罪数额方面提高了“馈送、收受礼物”行为的入罪门槛,但实际上官员们并未将此标准运用于审判实践中,仍是依《大清律例》所规定的标准量刑进行裁决。“在一个国家里要肃清腐化常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降低衡量公职人员行为的准则;另一方面则要使这些官员的行为大体向此种准则看齐。这样做,行为和准则虽都有所失,但却能获得准则和行为在总体上的更大和谐”。<sup>[2]</sup>通过把官员应遵循的标准稍微降低一点,再设法把官员的行为向这些标准拉近一点,这或许不尽符合某些人的纯粹理想,但总比任由形式主义泛滥要好。

### 3. 判决标准含混,权力操纵审判

权力始终凌驾于法律之上。虽皇帝多次强调:“此风(馈送之风)断不可长,夫吏治以操守廉洁为本而持廉之道……属员亦不得藉端献媚,俾督抚得洁己秉公,尽察吏安民之职设……我皇考澄重整饬之良规,万世所当遵守者,何忍稍有。”<sup>[3]</sup>然与此同时,官员处理案件难以摒弃个人感情好恶,知县杨伯龙收受王延弼礼物一案,杨伯龙依坐赃致罪,在追查此案中,隰州车敏来自行揭报曾馈送杨伯龙蟒缎银杯,只罚了三个月俸禄。<sup>[4]</sup>此处车敏来“馈送礼物”之行为应适逢知县杨伯龙生日,被官员视为“虚礼”,认为可以免于追究,故而施以小小惩戒。《收受监生朱砂价门礼充公照坐赃纳赎俱免案》一案蒲圻县知县许炯收受监生张正翰等朱砂价、门礼共银七十二两,按照律法许炯应当答五十,不应纳赎,但督抚认为许炯非因事受财系坐赃致罪,情罪较轻,已于本案革职,

便应准其纳赎俱免。<sup>[4]</sup>乾隆三年,大田县知县叶云拱生辰,有生监叶逢春、廖学灏、余正壮、张永盛、林廷壁、杨文仁等六人各送银杯一双,并各生监送叶品、水礼、土宜、绌布共九十一疋,计共值银四十二两七钱,叶云拱收受入己,被福建巡抚视为接受馈送礼物罪,叶云拱已经病故便不再追究;同时巡抚认为叶逢春等因叶云拱适逢生辰往祝,非无端馈送,可比应予免议。<sup>[4]</sup>不仅官员多次“馈送、收受礼物”案件的审判中掺杂个人情感好恶,帝王也不断利用权力改变判决结果。多位大臣因馈送触犯刑律,应秉公交由刑部议处,但统治者多次法外开恩,将犯事官员革职留任。《侍郎广兴受贿大案》是清朝嘉庆皇帝惩处政府高级官员贪赃受贿的一个典型案件,广兴赴山东审理案件,东昌知府嵩山送一千两,聊城县知县郭捍送一千两,均为程仪费银。二人案发后均革职。河南巡抚马慧裕两次馈送广兴盘费一千两,部议降四级调用,嘉庆帝下令开恩,改为革职留任,巡抚阮元,曾馈送广兴公帑银一千两,皇帝亦加恩革职留任。<sup>[5]</sup>《收受捐监陋规降革各员从宽留任分别年限开复案》一案曹显庚收受陋规及失察家人犯赃,乾隆帝念人员众多,格外加恩,均从宽留任。<sup>[6]</sup>

## 二、物的礼化:官场中礼物的多重属性

在历史的比较中,封官买爵在当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腐败,而在封建时代则是制度本身所容纳的一种补偿机制。传统社会中的“礼”弥合了正式制度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得到了正式制度的默许,这

[1] 杨一凡编:《清代成案选编(甲编)》第4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9页。

[2] [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沈宗美校:《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8页。

[3] 《乾隆起居注》,乾隆元年十二月条。

[4] 杨一凡编:《清代成案选编(甲编)》第19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63-264页。

[5] 牛创平、牛翼青:《清代一二品官员经济犯罪案件实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368页。

[6] 杨一凡编:《清代成案选编(甲编)》第19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69页。



类行为是半公开的、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官场中“礼物”的流转正是非正式制度中的关键一环，其内在属性也必须更进一步加以明确。

### （一）政治属性

在封建专制集权的制度背景下呈现的即是“尊卑有序”的社会环境，在清朝官场亦不例外。《荀子》载：“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大意是礼，把钱财物品作为工具，把尊贵与卑贱的区别作为礼仪制度，把享受的多少作为尊卑贵贱的差别。在此语境下，财物作为一种象征性工具，与清朝官员提高政治身份的需求相契合，下属官员通过赠送礼物表达自己的“礼”，即“尊敬与服从”上级官员的政治身份，上级官员接受礼物意味愿意接受这种“臣服”。

从国家关系来看，国与国之间的“礼”可以通过“朝贡”完成。明朝朱元璋设计并发展出一套完备细密的外交制度安排——“朝贡体系”，通过特定的朝贡仪式、朝贡礼物展示宗主国的“威仪与隆恩”和藩属国的“尊敬和服从”，从而完成一种“权力支配关系”的表演。礼物外交是国际关系学和外交学研究关注的一个细分领域。礼物不同于商品，作为国际交往与外交仪式上的国家礼物更是具有独特价值，不仅有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更有艺术价值、情感价值和象征价值。<sup>[1]</sup>从个人关系来看，官与官的“礼”可以通过“节礼”完成。官员上任、调任、致仕等一系列活动，属官有迎送之礼，并有上奉程仪之惯例，各大小节日，属员馈送“节礼”，“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sup>[2]</sup>在各式礼物的表达中，官员建立起一种较为熟悉的稳固的政治交往，在官场运作过程中形成社会网络，在此熟人网络中能够更自如地完成各项公务。

### （二）经济属性

据《东华录》载：“查顺治四年所定官员经费录内，各官俸薪心红等项，比今俸银数倍之多，犹为不足……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余日将忍饥不食乎？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若督抚势必取之下属，所以禁贪而愈贪也。”<sup>[3]</sup>陕西巡按何承都在顺治九年上疏《省冗官疏》：“吏员多难以求治，俸禄鲜薄未可责廉，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而益俸，诸州县宜以户口

为率差减其员，旧俸日增给五千，咸得开国之要矣。”<sup>[4]</sup>“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sup>[5]</sup>清朝沿袭明朝的低俸制，官员正常收入难以覆盖其生活成本，加之刑名幕友并未纳入国家正式编制，需得州县官为其支付薪金。礼物所带来的巨大收益，能够对央地财政制度裂隙起到部分的弥合作用，瞿同祖先生直白地指出：“州县官有限的薪水怎样才能满足如此巨大的费用呢？答案就在被称为‘陋规’（‘惯例性收费’，意即‘丑陋的规矩’）的惯例之中，通过在每一个可以想象的场合收费，中国官僚体系的每一层级的成员们都能补充他们的收入。”<sup>[6]</sup>学者曾小萍曾将古代“规礼”纳入清朝地方财政体系中的“非正式经费体系”中的一环，正是州县官这种趋同的利益，构成了非正式经费体系的支柱，并使之运转起来。这样一来，州县官的仓库成为其他所有官员的食槽。而反过来，州县官依赖衙役和书吏，利用他们从各种各样的纳税人那里攫取零碎的银子来填充这一食槽。<sup>[7]</sup>

### （三）文化属性

中国传统儒家话语中，“礼”具有统摄全局的作用。在纯粹理想主义的构想下，赠送礼物不图回报，只是内心对“乐善好施”的自然追求，对“慷慨道德”的自我成就。“图报”是不合乎

[1] 向勇：《明清朝贡体制下的文化交流与实物往来》，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8卷第5期，第5页。

[2] [清]葛士濬编：《皇朝清经世文编》卷十六，吏政一，清光绪石印本。

[3] [清]蒋良骥撰，鲍思陶、西原点校：《东华录》，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39页。

[4] [清]贺长龄编：《皇朝清经世文编》卷十八，吏政四，清光绪十二年思补楼重校本。

[5] [清]顾炎武撰：《日知录》卷十二，清乾隆刻本。

[6] 瞿同祖著，何鹏校：《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7] [美]曾小萍著：《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董建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79页。

礼的,“施而不求其报,君子之义也”。<sup>[1]</sup>“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接受传统儒学教育的士大夫奉行“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弘旨,将“仁”作最为重要之出发点,正如陈顾远先生所总结之:“所以中国文化系以人类幸福为领域,以伦理道德为基础,重视人人对社会的义务,轻视人人对事物的权力;本于人性,出于人情,守亲亲之义,尚中庸之德,达忠恕之道便是。”<sup>[2]</sup>回到现实,从效果主义的角度作出一番推测,正如翟学伟关于“人情、面子与权力”的理论研究所揭示的那样:“恩惠的本质含义在于为他人做事并使他人因此而长久地感激并设法回报……情理社会在人情往来上的非对等性,在于期待彼此因为情的产生而使交换关系不是一次(或若干次)性地完结,或结束一次重新开始下一次,而是期待发生了一次之后就能连续性地循环下去。”<sup>[3]</sup>礼记有言:“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记·曲礼》)中国人希望与他者拥有一种有来有往的长久联系,馈送礼物之后,他们不愿意接受一种“当下给予,当下回报”的交往模式,他们将这种方式视为一种冷漠的拒绝,他们期望对方将这份情意无言地或者说没有负担地接受。布迪厄也曾思考间隔时间的作用,他认为馈送礼物之后的时间间隔就是使那给予的人认为自己的馈赠是一种没有回报的赠与,使报答的人认为自己的回赠是无动机的,而且不是因为初始的馈赠决定的。<sup>[4]</sup>最先馈赠的人,通过“施惠”的方式,他们希望能够与“受者”完成“人情”的构建,这种“人情”在传统中国的语词体系中自然而然变成一种道德之债,即“人情债”。在此过程中,“关系”就被搭建起来了。

### 三、官场惯习:清朝“馈送、收受礼物”行为的发生逻辑

#### (一)制度基础——政治、经济体制为“馈送、收受礼物”提供自发动力

首先,清朝统治着超大规模的官僚集体和多族群的疆域,在财政军事体制上形成“地方化集中主义”机制,在确保了清朝中央通过正式渠道对地方行政体系和各项资源进行有效调控的前提

下,允许了地方督抚保留一定程度自主权,即通过非正式渠道掌控辖区内部分财政、军事和行政资源。<sup>[5]</sup>中央权力在深入基层的过程中被司道府州知县所分解,他们作为整个官僚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被官僚阶层内部的利害关系深刻影响并塑造,政治权力分散和下移的过程,亦是中央与地方反复博弈的过程。当清朝皇帝将目光集中在中央集权维护统治秩序时,部分法律搁置致使馈送、收受礼物习以为常,国家权力无法有效地渗透入城乡社会底层,也难以建设一个可以满足国家财政收入和社会控制的社会结构,相反,皇权总是被用来支配法律,通过法外开恩,以赦免、宽宥等方式将法律虚置,或者将其工具理性化,对官场收受、馈送礼物行为的惩治很多情况都出自皇帝的个人喜好以及政治平衡的需要。其次,当权力资本集中于州县官一人,官员职能履行缺乏政治激励机制,他们对于“馈送、收受礼物”行为的查处缺乏主动性、积极性与使命感,清朝官僚政治下的各个官僚,最大特点即是有其自身特殊阶级利益的封建剥削者,这一特点注定其将对君主负责,对层层上级负责,而非对平民百姓负责。他们很难去理解“礼物”对下层百姓造成的不公正与不平等,官僚政治体制创造出大多平庸的官员。当同时缺乏严密完备的监督机制时,上级官员直接对下级州县官行政、司法、钱谷等事项有监督、控制、管理之权力,同时,他们也被赋予选任、考核、奖惩下级官员的特殊权力,二者极容易建立起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时“礼物”成为建立双方往来的润滑剂,通过多人送礼、层层送礼建立起庇护网络,正是因其看上去“无事相求”,更能让官员放下戒备,这样有着“礼

[1] [周]卜商撰:《子夏易传》卷八,清通志堂经解本。

[2] 陈顾远著,范忠信等编校:《中国文化与中国法系——陈顾远法律史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3] 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页。

[4] 参见[法]皮埃尔·布迪厄著,蒋梓骅译:《实践感》,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160页。

[5] 参见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仪”“体面”等面纱的礼物往来在政治交往中能够稳固安全持续地进行，逐渐产生利益共同体，造成集体性腐败。最后，我们进一步观察不按照这套官僚政治制度运行的官员如何自处：清朝一官员张曾敷按例回避时，他写道：“惟现在亦不得调，回避后，天下竟无相口可补之缺。盖十八省虽字要缺，广西之泗镇与永顺闽泗镇近例专用能耐烟瘴之人，岂非无缺可补……此间台司未必知此苦情。曾敷……只好听之。若回避后，或调补泗镇，或须掣省候补，均不能堪，惟有告病回京，此则自计已决者也。素蒙长者爱护，此时亦无可为谋。”他还在一封信中称，数年来在仕途上没有进步，觉得“愧对故人……知难而退，现已决计归休”。<sup>[1]</sup>但在此后，张曾敷通过“捐官”，到达了仕途的巅峰。

清朝中央财政体系缺乏独立性，必须对地方财政有所依赖。“规礼”之所以能够在清初被帝王一再容忍，其原因正是“礼物经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央与地方财政体系的裂隙，通过侵渔百姓使得帝王与官吏之矛盾得以纾解。康熙这位千古一帝提出“永不加赋”，意在彰显皇恩，体恤下民，然清朝地方赋税难以为继之时，大部分赋税需折银纳入起运范围，同时裁减本就捉襟见肘的存留银以应付连绵不绝的军费开支，中央对官员还进行了严苛的罚俸制度，动辄罚一年薪俸，方大湜在《平平言》指出：“惟廉俸系应得之项，然实任全廉已经不多，署任半廉为数更少，州县官公事动辄罚俸，亦无俸可领，其匮乏自不待言。”<sup>[2]</sup>中央与地方的财政配置不合理，造成地方财政的制度性缺口，无法增加赋税，便只得通过另一种方式增加财政收入，无法填补的财政空缺只得以其他名头收取，各项往来无不加之礼物，“规礼”作为反动央地财政分配体系的一种工具，是一种本能对理性的反叛。《知府须知》一书中教导官员如何送礼：“应送各上宪礼物，详于手卷，不必再叙至于首府县，以及候补道府，诸公应如何致送折衷办可也，送上宪礼单应直书，平行礼单应横书。”<sup>[3]</sup>这些通过“礼”运作而来的财物能够维护官僚体制运转，保障官员的基本生存，也一定程度维护了官场稳定。坦率来讲，中国人很难为政治牺牲人情，通过“礼物”这一工具性表达，获得稳定的经济收入，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拥有了内在合理性。

## （二）外部环境——社交场域为“馈送、收受礼物”提供发生条件

从其发生的社交场域来看“馈送、收受礼物”行为具备隐蔽性之特征。首先，从空间上看，“馈送、收受礼物”之行为往往运作于看似“正常”的社会交往场合。一方面是公共场域。据《知府须知》所载官员到省事宜，其中包括“拜首府县”“谒见礼节”“答拜各官”“接见僚属”等一系列官员到任之固定礼仪范式，在此成型且稳定的基础上，上下级关系与权力结构便清晰地构建起来，此时的“礼物”成为道德与礼仪包装下的馈赠，“礼物”与上述仪式场域相重叠，与官员的个人利益相转合，其作用就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再者是私人场域，馈送行为多发生在双方熟悉的空间，拒绝陌生人的进入，这样就确保了私密性与安全性。其次，从时间上看，官场“礼物”的名称也总是礼仪性质的，一般发生的时间也有规律可循：所有的官吏，从最底层的县丞到总督，都定期向上司呈递已成惯例、数目确定的白银作为礼物。这些节礼包括上司的生辰规礼、新官的到任贺礼、拜见官员的表礼、每年主要节日的四节节礼。<sup>[4]</sup>这些因为有着送礼“由头”，总是能够得到法律上的宽容，曾有官员收受属官馈送生辰礼物一案，乾隆认为“适逢生辰往祝，非无端馈送，可比应予免议，等因”。<sup>[5]</sup>其余情形则是无规律可循之时间，因为其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故而也能隐蔽于官员日常人际互动之中。最后，从发生礼物往来的当事人来看，官僚、士大夫、知识分子、绅士，从本质而言，他们仍是不太相同的，尽管在某些场合他们拥有多种身份。这些欲求自保的资产阶级靠近政权、为皇帝当差、

[1] 转引自许飞：《晚清官僚制的个体透视：张曾敷政治生涯研究》，兰州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1页。

[2] [清]方大湜：《平平言》卷一，民国四年铅印本。

[3] [清]延昌撰：《知府须知》卷三，清钞本。

[4] [美]曾小萍著：《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董建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61页。

[5] 杨一凡编：《清代成案选编（甲编）》第19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81页。



进入官僚的战略,却并不是攻势,而是守势;不是积极的目的,而是消极的目的——并不想去“取而代之”,而是想逃避,“吃不到自己”。官僚和他们所掩护下的亲亲戚戚构成了中国社会所特有的“法律所不及的区域……”<sup>[1]</sup>馈送、收受礼物的双方为上下级的依附关系,层层相依,一般而言,“督抚为一省之表率,既收州县上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遗又不可却,而州县既送督抚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送又不可少……”<sup>[2]</sup>如果礼物能够顺利进入他们之间的关系中,他们将结为利益共同体,产生一种团体性的相互信任、相互庇护、层层遮掩的默契。

如雍正帝谕:“各属员从前曾有馈送贿赂何详书之处着,伊等——自行首出,朕皆开恩,免其处分,倘此时隐匿不首,或何详书自行供出,或何详书家人说出,或从别处访闻,定将隐匿不首之人,从重治罪。”<sup>[3]</sup>通过成案梳理,“馈送、收受礼物”案件案发情由大致有两类,其一是由官员其他贪贿案件所牵连而偶然被发现;其二是馈送、收受礼物之当事人主动揭发。礼物的馈送、收受行为在隐蔽的场域快速发生,“与者”与“受者”在此过程中利益趋向一致,人证、物证都难以准确获取,这样具备“安全性”的外部环境给予了馈送、收受礼物双方良好的社会交往条件。

### (三) 心理动机——“礼”文化为“馈送、收受礼物”提供内生力量

清朝官员有将“馈送、收受礼物”行为自我道德化、合理化的倾向,儒家传统“礼”文化为其提供内生力量。名幕汪辉祖就有这样的看法:书吏、差役收入菲薄,如收取陋规仅为谋生,在山靠山,在水靠水,官法亦不能禁止,自不必过分禁止。<sup>[4]</sup>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指出:“诛极愈众,而贪风愈盛。或且惴惴焉惧罹法纲,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地。非其时人性独贪也,盖有内隐为驱迫,使不得不贪也。”<sup>[5]</sup>在实践中,馈送与收受礼物者他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财物往来视为人情往来的礼物或者是朋友之间的馈赠,他们通过自我道德化的表演完成礼物交换这一微观的社会过程。<sup>[6]</sup>对于“与者”而言,主观上很难通过“馈送礼物”之行为直接推定“与者”有谋取不正当利益之目的,如

果说将“馈送礼物”之行为作为一种伦理选择与道义诉求,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下是能够得以成立的,并且不能要求“与者”加以证明;而从客观形式出发,“馈送”之所以与“贿赂”不能直接化约,其原因在于“馈送”之行为在发生的当下并未对法制秩序与社会公正造成损害,而在此后是否会因为此前行为而破坏某种秩序是无法预先知道的,或者说是“与者”自己也难以确定的。对于“受者”而言,礼物有其存在的历史基础,清朝以前地方官吏普遍收受规礼,且并未设置法律加以規制,至康熙年间因其泛滥成灾,不得不一切革除。此时提高道德标准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一对立完全是在道德领域中,也就是在属于人类历史的领域中运动,在这里播下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恰恰是最稀少的。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sup>[7]</sup>

## 四、合法性反思——“馈送、收受礼物”律例规制的发展限度

我们难以在清朝规范规制以及司法实践中探寻到“礼物”与“贿赂”的一个合理的分割界限,也难以揣摩官员、帝王所判断的“可免议”之“礼物”与“不可免议”之“礼物”二者的区别,这里无可回避地产生出一些问题:为什么官场馈送、收受礼物之情形普遍存在但

[1] 费孝通、吴晗等著:《皇权与绅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2] 《乾隆起居注》,乾隆元年十二月条。

[3] [清]胤祯撰:《雍正上谕内阁》卷五十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

[4] [清]汪辉祖:《佐治药言·省事》,同治十年慎间堂刻汪龙庄先生遗书本。

[5] [清]薛福成撰:《庸庵笔记》卷三,清光绪二十三年遗经楼刻本。

[6] 参见李辉:《贿赂中的自我道德化与嵌入性腐败——基于H市纪检监察机关档案的一项文本研究》,载《社会》2009年第29卷,第85-106页。

[7]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0页。



成案记载量如此稀少？一个高度腐化政体拟定的超高标准律例能否在现实社会中发挥效用？为何清王朝中央极力官方极力证明革除规礼之合理、合法性，但在司法实践中一再妥协或者说是无能为力？“馈送、收受礼物”之律例规制连续不断加码，在此过程中惯例如何被打破，常情如何被入罪？从积极的方面来讲，早熟的立法，在其一时的效力方面，或许要打一些折扣，但在启迪人民意识方面，却有极大的作用。可以称其为“法教”。<sup>[1]</sup>清朝官场“馈送、收受礼物”之行为加剧了州县官公权力滥用以及官僚政治制度进一步腐化，通过严密的立法规定将其纳入王权治理的轨道之中，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礼物”与“贿赂”一般关系的界定应与政治经济社会相契合，在儒法国家的大环境中，“馈送、收受礼物”之行为在没有权力指涉、只存在与私人关系中的领域中需要得到尊重与保护。当清王朝皇帝与官僚的司法技艺无法弥合法律的一般性规定与社会生活事实之间的距离时，法律就极易被利用、被曲解、被虚置，这里呈现出清朝法制建设与非正式制度运行之间存在的内在张力的同时也昭示了清朝国家治理文明的困境，下文将用三个悖论解释概括这一立法的背后逻辑与其中的制度纠结。

### （一）清官廉吏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悖论

德性的完善是有价值人性的追求目标之一，追求社会人伦的和谐则是人类的永恒使命和目标。清朝入关之后，帝王奉行儒家文化，希望造就一批仁人君子为国家效力，如康熙皇帝一生崇尚儒学，他从小便学习儒家学说，他认为儒学是为人处世之道，他还把儒学和治国之道联系起来，并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之本。帝王企图以严苛的律例使得各官僚成为仁人君子，企图维护一种绝对纯洁的政治活动以及用道德束缚人性以弥补制度的不完善。知识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更尊。所以根据“道”的标准来批评政治、社会从此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内之事。<sup>[2]</sup>梁漱溟曾分析到，中国制度似乎始终是礼而不是法。其重点放在每个人自己身上，成了一个人的道德问题。它不是借着两个以上的力量，互相制

裁，互相推动，以求得一平均效果。而恒视乎人之好不好。好呢，便可有大效果；不好，便有恶果。因此就引人们的眼光都注到人身上，而不论是向某个人或向一般的人要求其道德，都始终是有希望而又没有把握的事。那么，就常常在打圈子了。二千余年我们却多是在此等处努力。<sup>[3]</sup>正如王亚南所批判的，在一般无知无识的人民固不必说，就是自认为穷则“寓治于教”，达则“寓教于治”的士大夫阶层，历来就很少有人想到这种政治形态以外去。他们像从来没有什么政治理想，如其说有，那也不是属于本来的，而是属于过去的。“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以致“协和万邦”的空洞词句，被翻译增饰为“修”“齐”“治”“平”的大道理；唐虞三代的无中生有的“盛世”，变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大口实，而由“明君、贤臣、顺民”结合成的政治理想图案，始终在被宣扬着、漠然地憧憬着，但又似乎从未好好实现过。<sup>[4]</sup>帝王希望用法律代替德治教化，用严厉的惩罚造就清官良吏，无异于缘木求鱼，当庞大的官僚群体“无以为衣食”之时，还要求其保持以道自重的节操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出现“枉道而从势”“曲学以阿世”的局面也实属必然。

### （二）仁政爱民的“名”与“实”之间的悖论

从官方表达看见，无论是康熙帝还是雍正帝在强调馈送、收受礼物有害于民生社稷，对此行为严加禁绝是出于仁政爱民的考虑。“一切官僚社会都是讲形式的，许多法律往往不是为了实行，而是为了‘装饰’或‘掩饰’”。<sup>[5]</sup>国家政权的强大，得力于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全方面的控制，这离不开一个庞大官僚系统的支

[1] 王伯琦：《近代法律思潮与中国固有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2]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6页。

[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

[4]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4页。

[5] 同上注第126页。

持,这会带来官僚系统的膨胀和腐败。强有力的政权,始终是以牺牲底层民众的权利为代价的,当官僚系统榨干了底层民众时,叛乱也就可能随时爆发,政权遂失去维系自身稳定的基础。<sup>[1]</sup>帝王不断斥责官僚群体鱼肉百姓的行为以及传达出大力惩处贪官污吏的愿望,事实上在百姓心中形成了一种印象——皇帝也是反官僚的——由此,皇帝顺理成章站在了百姓一边。历代皇帝以“天命”为王权合法性背书,有关君权神授最早的记载是“有夏服(受)天命”(《尚书·召诰》),在人力牢牢受限于自然之力的中国古代社会,百姓对“天”的旨意深信不疑,“天命”为王权架托起至高无上的神圣性与合法性,此后帝王通过世袭制度延续皇权,以血缘的正统性延续王权的合法性逐渐遭到百姓的抵触,为释明此疑问,他们开始修正自己的合法性来源,强调“以德配天”。德者,得也,得民心之谓也。为获得民心则需体恤民生,换言之,在周公的理论体系内,“恤民”就是“修德”“敬天命”的必经途径。然则,如何恤民?周公以为,“‘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平易近民,民必归之’,职是之故,圣王贤君应当‘彼裕我民,无远用戾’,应当‘怀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齔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sup>[2]</sup>清朝皇帝意识到地方财政无力支撑庞大的官僚机器运转,当各项陋规事实上弥合了部分财政支出的需要,他们选择了默许态度,而当各种各样的额外陋规不断涌出,礼物馈送日渐成风,甚至超过正常税收的十几倍时,雍正帝及时进行改革,将耗羨归入国库,另外发给官员“养廉银”,同时以严厉的律例规制馈送、收受礼物之行为,以重新获取百姓信任和爱戴,从根本上看,逐项举措同样是以保障百姓生计为“名”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之“实”。

### (三) 中央集权与有效治理之间的悖论

学者周雪光对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名实分离的情况作出了这样的分析:组织一元化强化了正式制度,不容非正式分享其权威,但并没有取消非正式制度;在正式结构上两者关系不再是共生并存,各司其职,而是前者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地位。在这一背景下,两者互动

带来了国家治理的紧张。一方面,正式制度需要非正式制度的运作来完成任务;正式制度的刚性加剧了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矛盾紧张,更需要非正式制度的积极参与来缓和解决。另外一方面,非正式制度建立在不同的合法基础上,其运行可能削弱正式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sup>[3]</sup>诚如上文所言,礼物所带来的巨大收益,能够对央地财政制度裂隙起到部分的弥合作用,从这个意义出发,官场中的“礼物往来”维护了国家财政制度的大致平衡。当馈送、收受礼物的实际状态偏离国家治理轨道时,官员在礼物的馈送往来中建构了自我的身份认同、政治认同,影响了自我的政治归属,也制约着自我政治忠诚。私下的“礼物往来”建立起来的强大隐秘的关系网络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皇权的监视与控制,中央不能及时有效地作出调节和变动,极有可能形成“山头主义”“裙带资本”“割据势力”等,威胁中央集权。

当清朝皇帝下定决心着手惩治该行为时,又无可避免地面临着治理的困境。首先,“腐败首先是一个制度问题,其次才是道德问题。在制度层面,腐败的源头无疑是权力的不受约束和权力决定一切,但官员的薪酬或者俸禄水平能否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是否和他们手中的权力匹配,则是诱发腐败最直接、最具体的原因。如果官员没有体面的收入,无论是崇高的道德说教,还是严厉的法律惩处,最终只能事与愿违”。<sup>[4]</sup>清朝央地财政分配不均,州县官不得不截留国税、加征附捐,又通过各式名目增加灰色收入以维持县衙运转,是造成非正式制度盛行的根本原因,如果统治者无法正

[1] 参见曹正汉:《“强政权,弱国家”: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国家强弱观》,载《开放时代》2019年第2期,第179页。

[2] 叶树勋:《传统语境下“以德配天”的法理意涵——以政治合法性救济为核心》,载《历史法学》2011年,第361页。

[3] 周雪光:《论中国官僚体制中的非正式制度》,载《清华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第26页。

[4] 张宏杰:《顽疾:腐败与反腐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5页。

视财政制度自身的弊端，法律规制也只能是一个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美好幻想。其次，拥有辽阔疆域的清王朝难以建立起一个快速下达号令以及收集各地情况的信息传递系统以及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国家治理能力本身的局限性导致中央对馈送、收受礼物等行为存在着控制无力的弊端。更进一步讲，上级政府为了防止共谋而集中权力，加大执行过程的激励强度，推动组织制度正式化；而这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恰恰诱导、强化了共谋现象：权力越集中，治理力度越大，基层政府面临的执行压力越大，其经营各种关系网络的冲动越强。<sup>[1]</sup>最后，在落实到具体的案件时，审判官员是否关注“馈送、收受礼物”行为发生之背景，是否参考了“与者”与“受者”情感上的交往基础，对于馈送礼物之价值，以及馈送缘由、时间与方式是否有着深入的分析和思考，上述都要求统治者对是否应该治理、如何治理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治理等问题作出回答和解释，这体现了清朝国家政治文明的治理困境，也体现了权力反腐、法律反腐与制度反腐之间存在的巨大罅隙。

## 五、结语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篇）。法律不能只是充满理想主义的幻想，不能建立在最高道德之上，常人难以克服弱点和矛盾不足以全然用制度加以禁绝，这样既不合理，

也不现实。在此，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在坚持法的权威性与进步性的同时，如何坚持法的现实性与稳定性？

“法治应包括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sup>[2]</sup>毋庸讳言，法学界仍面临传统与现代的考验，中国社会有独特的法律文化体系，它扎根于本民族深厚的传统文化心理和集体意识的土壤里形成惯习与风俗，它重视着经验的力量和守旧的历史，无视这样的国情，在形式上嫁接新的制度，不免是一种徒劳。任何道德原则都无法架空于社会历史、国家阶级而独立生长，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环境中形成自身的道德，而更多的时候，获得自身所处阶级的道德。阿伦特也曾提醒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我们是在与那些在智力、良知、规范思维能力的来源方面都与我们不同的人一道分享这个世界”。<sup>[3]</sup>易变的社会现实与法律规范之间的调和必定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朝一夕相互妥协磨合而生成，规范与现实之间“缺口”的存在决定着法二者之间常常发生碰撞与断裂。在反腐形势全面向好的今天，我们应当时刻反思清朝康乾时期阶段性、选择性反腐措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坚持法律至上，坚持制度化、常态化的反腐建设，警惕“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罗网以及制度异化的危险。

[1] 周雪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载《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第17页。

[2]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02页。

[3] 参见[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